

农村民间借贷的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健康冲击视角的分析

许庆 刘进 杨青

【摘要】目前因病致贫已成为中国农村贫困的突出问题,如何缓解农民的因病致贫是精准扶贫的工作重点之一。文章利用2010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贫困发生率和贫困脆弱性两方面讨论了健康冲击下民间借贷(特指零利息亲朋间借贷)对农民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尽管民间借贷缓解了农民应对疾病风险的资金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贫困发生率,却会造成农民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贫困脆弱性)增加。因此,文章认为,在今后的扶贫减贫政策安排上,一是要加大健康卫生投入,改善农民的健康福利状况;二是需要引导民间借贷合法化、规范化,发挥民间借贷在精准扶贫上的重要作用;三是采取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益等措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关键词】健康冲击 民间借贷 减贫 贫困发生率 贫困脆弱性

【作者】许庆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教授;刘进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杨青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过去30多年,中国农村反贫困工作尽管取得重要成就,累计实现7亿多^①农村人口脱贫,但是仍存在贫困群体规模较大、贫困程度较深等问题。按中国现行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贫困标准,2015年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5575万(国家统计局,2016)。对此,自2015年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以来,中国政府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而要精准扶贫,就应精准识别哪些人需要扶持、谁来扶持及如何扶持等内容。国务院扶贫办201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全国7000多万贫困农民中,因病致贫人口高达2900多万,占

* 本文为上海财经大学国家地方战略问题研究项目“进城农民的农地退出机制研究,改革路径设计及相关政策评估”(编号:2015110976)的阶段性成果。

① 按照中国现行的2011年贫困标准每人每年2300元测算,197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7亿,2015年减少到5575万人(国家行政学院编写组,2016)。

42%^①。现有研究指出,大病等健康风险冲击使患病农户人均纯收入平均降低 5%~6%,并且健康风险冲击的长期影响可持续大约 15 年,这种冲击对于中低收入农户的影响更为严重(高梦滔、姚洋,2005)。目前,医疗费用的上涨幅度已超过农民收入的上涨,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劳动力通常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旦健康状况出现问题,将导致整个家庭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许庆、刘进,2015)。因病致贫已成为当前农村贫困的突出问题之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特别是如何解决重大疾病对农民的冲击是未来精准扶贫的方向。

为了改善农民健康状况,解决农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中国政府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大多数经验研究(程令国、张晔,2012;张锦华等,2016)认为,新农合制度明显提高了参合农民的健康水平,但仅有少量研究认为该制度的减贫效果明显,有利于降低农户的贫困发生概率(齐良书,2011)。这是由于该制度在政策设计安排上具有歧视性和地域差异,从而可能使其减贫效果有待考量。比如,新农合在住院报销上采取的是由乡、县及县外三级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封顶线所组成的一种部分负担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不同地区定点医疗机构诊治结果互认的分割、基本药品报销目录与范围的不一致,以及采取参合农民先垫付后报销的报销方式。因此,当农户遭受健康冲击尤其是大病冲击时,高额的医疗费用往往造成农户的医疗负担,进而使其产生外源性借贷需求。

然而,由于农户收入较低且不稳定,农户借款额度较小,在正规金融机构看来存在规模不经济问题,交易成本较高,正规金融对其提供贷款可能会非常谨慎,在贷款额度、期限、用途等方面有较为严格的限制,在担保方面提出严格的要求,导致农户即使愿意支付当前银行贷款利率甚至更高的利率也无法获得贷款(Stiglitz 等,1981)。因此,在正规金融可得性有限的前提下,即使存在一些专项扶贫的低息小额贷款项目也无法满足最贫困农户的资金需要,农户往往只能求助于亲朋好友或民间金融组织等民间借贷。此外,农户尤其是贫困户有时会需要用于平滑消费(在本文中主要是应对疾病风险)的资金,而这种需要只能通过民间借贷来满足。关于民间借贷行为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已有文献资料尚无法得出明确的判断。经验研究证据表明,民间借贷能通过提高农户的信贷可获性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和缓解贫困(唐礼智,2009;张宁、张兵,2015),但这种影响却具有门槛效应和地区效应(苏静等,2013)。那么,为应对健康冲击而发生的民间借贷行为对农户贫困到底有什么作用?主要通过何种机制发生作用?这是本研究希望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利用 2010 和 2012 年两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厘清健康冲击和民间借贷关系的基础上,分析民间借贷对农户减贫的影响。

通常民间借贷不受政府监管或控制,主要是亲朋之间以货币形式、零利息借款行为,

① 搜狐新闻网:《多维度消除“因病致贫”》,2016 年 1 月 14 日(<http://mt.sohu.com/20160114/n434484593.shtml>)。

以及游离于经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之外所有以货币形式、利息回报的个人与企业之间资金筹措活动。事实上,具有道义属性的农户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筹集健康、教育、房屋建设等生活消费性资金通常是一种零利息互助性借款,即使是创办自营工商企业等生产投资初始投资和后续发展所需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亲朋间零利息借款(马光荣、杨恩艳,2011),因此,在本文中主要考察零利息民间借贷行为对农户贫困的影响。

二、文献述评

毋庸置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使农民尤其是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道路上,研究中国农村贫困与脱贫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关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在此不再赘述,仅做简要梳理。部分文献从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夏庆杰等,2011;罗楚亮,2012;陈飞、卢建词,2014)、公共投资和扶贫政策(林伯强,2005;张伟宾、汪三贵,2013)、健康资本(王弟海,2012;程名望等,2014)、教育培训(章元等,2012)和就业(都阳、万广华,2014)等多个维度对减贫的影响。

回顾现有关于民间借贷反贫困效应的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国外学者主要是基于小额信贷或微型金融的视角进行研究。Mosley等(1998)考察了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起的小额信贷机构的减贫效应后发现,微型金融有助于缓解穷人的信贷约束,增强其消费能力。Imai等(2012)基于99个发展中国家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微型金融不仅能有效降低贫困发生率,还能显著降低贫困的深度与强度。但也有学者(Navajas等,2000)质疑微型金融的减贫效应。

与国外相关研究相似,国内学者关于民间借贷减贫效应的研究结论也并不一致,且相关研究较少。唐礼智(2009)认为,从长期来看,民间借贷在促进农民增收的效率上高于正规金融;民间借贷对农民增收的短期促进效应比长期效应明显。张宁、张兵(2015)的研究表明,农村民间借贷主要服务于低收入农户,一个村的民间借贷发展规模对该村基尼系数和贫困人口占比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收入最低的农户纯收入占比的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即农村民间借贷通过为低收入农户提供金融服务而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及贫困具有缓解作用。

就以上文献看,已有研究从多种角度考察和分析了农村贫困与减贫问题,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国内有关于民间借贷反贫困效应的经验研究较少,也没有将健康冲击纳入研究框架内。事实上,在农村医疗保障可及性与正规金融可得性均不足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既扮演医疗保障功能又充当正规金融的角色。(2)在数据使用上,部分学者使用宏观统计数据,其缺陷是民间借贷水平只能采用代理指标(如用农村农户和非农户投资资金来源中自筹资金与其他资金之和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使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农村民间借贷的水平;还有一些学者采用某地区微观截面的调研数据,较少使用追踪数据,难以反映民间借贷减贫的动态过程与效果。

三、实证模型与数据变量说明

(一) 实证模型的设定

本研究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是否贫困”,设定的计量模型为:

$$y_{it} = \alpha_0 + \alpha_1 \text{loan}_{it} + \alpha_2 \text{shock}_{it} + \alpha_3 \text{loan_shock}_{it} + \alpha_4 x_{it} + \alpha_5 z_i + \varepsilon_{it} \quad (i=1, \dots, n, t=2010, 2012)$$

其中 i, t 分别表示观测个体与时期, y_{it} 表示第 i 个农民在第 t 时期的贫困状况, 即“是否贫困”, 是二元虚拟变量(否为 0, 是为 1); loan_{it} 、 shock_{it} 均为二元虚拟变量(否为 0, 是为 1), 分别衡量第 i 个体在第 t 时期是否发生民间借贷、是否遭受健康冲击; loan_shock_{it} 为“是否民间借贷”与“是否遭受健康冲击”的交互项; x_{it} 为随观测个体 i 和时间 t 变化的控制变量(如年龄、婚姻、家庭农地面积等人口社会经济学特征); z_i 表示不随时间 t 而变的个体特征(如性别等); ε_{it} 为随个体与时间而改变的扰动项; α_0 为常数项, $\alpha_k (k=1, \dots, 5)$ 为待估系数。

(二) 数据来源与主要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 2010、201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该调查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 3 个层次的数据, 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2010 年 CFPS 基线调查覆盖 25 个省份, 样本规模为 14 798 份, 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2012 年数据为 2010 年的追访数据和部分新增样本数据, 样本量为 13 315 份。剔除城镇样本和相关变量缺失的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 3 395 份, 其中 2010 年 2 371 份、2012 年 1 024 份。本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关键变量如下。

1. 健康冲击。由于农户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即使医疗费用支出从绝对值上看并不是很多, 也可能超出贫困农户承受范围, 以致不能满足基本的消费需求, 陷入贫困状态或者进一步恶化贫困状态。参考高梦滔、姚洋(2005)的做法, 本文将“家庭医疗费用超过 5 000 元”视为“健康冲击”, 即若超过 5 000 元, 则为遭受健康冲击, 取值为“1”; 否则为“0”。

2. 贫困。贫困与否包括目前和未来两个方面, 前者可用贫困发生率度量, 后者则用贫困脆弱性表示。(1) 贫困发生率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贫困个体占有所有个体的比率。识别家庭是否贫困的判断标准主要是看当前家庭人均年收入是否高于贫困线; 若高于则说明没有发生贫困, 取值为“0”; 否则发生贫困, 取值为“1”。本文所使用的贫困线是中国 2011 年实行的贫困标准, 即每人每年 2 300 元。(2) 贫困脆弱性指农户将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 能识别目前并不贫困但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农户, 以及那些未来将无法脱离贫困的家庭或个人。关于贫困脆弱性的测量, 本文采用 Chaudhuri 等(2002)的估计方法^①, 在此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 农户家庭是否具有贫困脆弱性取决于脆弱线^②, 参照万广华、章元(2009)的做法, 本文将

① 计算公式为: $V_{i,t} = P(Y_{i,t+1} \leq \text{poorline})$, 其中 $V_{i,t}$ 表示第 i 个家庭在 t 时期的脆弱性, 即家庭未来收入 $Y_{i,t+1}$ 低于贫困线(poorline)的概率。具体计算步骤详见 Chaudhuri 等(2002)的研究, 囿于文章篇幅, 这里不再详述。

② 脆弱线是指在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度量贫困脆弱性的情况下, 以多高的比率来界定一个家庭或个人属于脆弱与否(万广华、章元, 2009)。

50%视为脆弱线,若大于或等于该值则说明未来发生贫困,取值为“1”;否则为不发生贫困,取值为“0”。

3.其他变量。本文中受访者个人特征主要包括教育水平、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其他控制变量为家庭劳动力人数(不包括家庭65岁以上老人数和15岁以上全日制学校在校生)、是否自营工商业(衡量非农就业程度)、医疗保险参保行为、土地面积、自家婚丧嫁娶支出等。

四、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 基本描述统计分析

表1给出了主要变量的基本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全部样本的贫困发生率为56.8%,2012年为53.8%,比2010年低约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贫困脆弱性也由2010年的56.2%降至2012年的51.8%。这说明,尽管中国农村扶贫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仍有一半左右的农民面临陷入贫困的风险,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如何精准扶贫仍是重要挑战。从借款渠道层面看,能够获得正规金融机构信贷服务的农民较少,占观测样本的12%左右,且这部分人群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较低,为2 700~4 000元;而通过民间借贷活动(即向亲朋借贷)筹集资金的农民则有35%左右,并且筹集的资金额也比正规金融机构多4 000~5 500元,这说明非正规金融在农户的借贷需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对正规金融的主要补充。

从健康冲击层面来看,农民遭受健康冲击的可能性呈增加趋势:2010年有32%的受访者其家庭医疗费用超过5 000元,2012年则超过了37%,这体现了由于生活工作环境的改变,地方性、常见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增加,以及年龄的增长,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医疗费用日益增加,从而可能提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发生率。当然,医疗支出超过5 000元的样本增加也可能是由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加,加大了预防和康复等医疗支出。在年龄上,全部受访者的平均年龄在49岁左右,2010年受访者的平均年龄超过50岁,2012年则约为47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着中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普遍离开农业,农业劳动力出现老化现象。在性别上,各样本间无太大差别,超过60%的受访者是男性。从受教育水平来看,受访者主要以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为主,体现中国农业主要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较低,需要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民的教育人力资本,以增加其收入,从而使其脱贫。从家庭特征方面来看,医疗保险参保率超过90%,主要是在中国农村实施了以大病保障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了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此外,表1还给出了家庭土地面积、非农就业(即自营工商业)、自家婚丧嫁娶支出及家庭劳动力数量等均值描述。

(二) 回归结果分析

1. 民间借贷对农民贫困发生率的影响

表2给出了民间借贷对农民贫困发生率的模型回归结果。计量结果显示,伪拟合优度

R^2 为 0.0952, Wald 卡方值为 387.19, 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该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

本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是健康冲击、民间借贷对农民贫困发生率的影响。表 2 回归结果表明, 尽管民间借贷对农民贫困发生率的影响为负, 但并不显著。健康冲击使农民发生贫困可能性大大增加, 这与预期相符。边际效应计算结果显示, 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与没有遭受健康冲击的农民相比, 遭受健康冲击者发生贫困的概率增加了 30%。民间借贷与健康冲击的交互项对农民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显著为负, 这说明, 当农民遭受健康冲击后通过向亲朋借款能够降低贫困的发生率。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 由于与正规金融不同, 民间借贷特别是亲朋间零利息借款, 是一种基于地缘、血缘及友缘关系的借贷行为, 具有交易成本

表 1 样本基本描述性统计(均值)

变 量	全部样本	2010 年	2012 年
贫困发生率	0.568(0.495)	0.582(0.493)	0.538(0.499)
贫困脆弱性	0.548(0.498)	0.562(0.496)	0.518(0.500)
参与民间借贷	0.353(0.478)	0.350(0.477)	0.359(0.480)
民间借款额(万元)	0.757(2.323)	0.672(2.240)	0.953(2.495)
参与银行借贷	0.119(0.324)	0.119(0.323)	0.120(0.325)
银行借款额(万元)	0.311(1.513)	0.273(1.396)	0.399(1.752)
健康冲击	0.338(0.473)	0.321(0.467)	0.377(0.485)
民间借贷×健康冲击	0.144(0.351)	0.138(0.345)	0.157(0.384)
年龄(岁)	49.319(13.827)	50.479(14.065)	46.632(12.870)
男性	0.635(0.481)	0.640(0.480)	0.624(0.485)
受教育程度			
初中以下	0.677(0.468)	0.680(0.467)	0.669(0.471)
初中及以上	0.323(0.468)	0.320(0.467)	0.331(0.471)
已婚	0.887(0.316)	0.876(0.330)	0.914(0.280)
家庭劳动力数量(人)	1.903(1.234)	1.717(1.217)	2.336(1.162)
土地面积(亩)	8.213(17.030)	7.476(12.466)	9.918(24.453)
自营工商业	0.060(0.238)	0.046(0.209)	0.094(0.292)
自家婚丧嫁娶支出(万元)	0.124(0.238)	0.145(0.202)	0.077(0.300)
参加医疗保险	0.936(0.244)	0.918(0.275)	0.979(0.145)
观测样本数	3395	2371	1024

注: 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

表 2 民间借贷对农民贫困发生率的影响(N=3395)

变 量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民间借贷	-0.056(0.059)	-0.020
健康冲击	0.863*** (0.066)	0.305
民间借贷×健康冲击	-0.201** (0.101)	-0.071
年龄	0.0002(0.002)	0.0001
男性	-0.018(-0.048)	-0.006
已婚	-0.069(0.073)	-0.024
初中及以上	-0.252*** (0.051)	-0.089
参加医疗保险	0.232** (0.094)	0.082
家庭劳动力数量	-0.117*** (0.022)	-0.041
自家婚丧嫁娶支出	0.772*** (0.167)	0.273
自营工商业	-0.244** (0.098)	-0.086
土地面积	-0.0002(-0.0013)	-0.0001
2012 年	-0.182*** (-0.054)	-0.064
_cons	-0.272(-0.157)	—
Wald chi ² (13)=387.19 Prob>chi ² =0.0000		
Log pseudolikelihood=-2100.0848 Pseudo R ² =0.0952		

注:(1)*、**、*** 分别表示在 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2)“—”表示不存在。(3)括号内数据为聚类标准误差。

低、借贷手续方便灵活、无须抵押物品等特征,降低了农民特别是贫困者获得金融服务的难度,使农民的信贷可获性提高,从而有助于获得生产生活消费性资金,避免陷入贫困。

从人口社会经济学特征来看,首先,受教育程度对农民贫困发生率的影响为负,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边际效应计算结果显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与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农民相比,初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农民发生贫困的概率降低了0.089。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越高,有助于提高其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收入增加。这说明,促进农民脱贫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加大教育投资,从而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提升其人力资本积累。其次,家庭婚丧嫁娶支出明显增加了农民发生贫困的概率。边际效应计算结果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家庭婚丧嫁娶支出每增加1万元,农民发生贫困的概率增加27.3%,说明当前农村高昂的婚丧嫁娶费用是造成农民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再次,自营工商业对农民向非农产业贫困发生率的影响为负,并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鼓励和引导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有助于拓宽增收渠道,从而降低贫困发生率。最后,医疗保险显著增加了农民发生贫困的概率。对此,一种解释机制是,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的实施不仅使参保人数明显增加,而且造成医疗成本大幅上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医疗卫生服务信息不对称、供给者诱导需求,但三级医疗转诊体系的失败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政策效果尚未体现。

除此以外,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易发生贫困,这是由于农村妇女承担着照料孩子、老人的家务,使其劳动时间减少,从而降低了收入水平。但这一结果并不显著,类似不显著的还有年龄、性别、婚姻情况等变量。

2. 民间借贷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表3给出了民间借贷对农民贫困脆弱性(即农民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的模型回归结果。计量结果显示,伪拟合优度R²为22.87%,Wald卡方值为526.36,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该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民间借贷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不显著;健康冲击使农民未来发生贫困的概率降低了约4%,这是由于近年来医疗保险特别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将特殊病种、重大疾病纳入报销范围,提高了农民的收益水平,有助于农民避免因遭受重大疾病后陷入“贫困陷阱”。民间借贷与健康

表3 民间借贷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N=3395)

变 量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民间借贷	0.002(0.077)	0.0004
健康冲击	-0.206*(0.085)	-0.041
民间借贷×健康冲击	0.270*(0.133)	0.053
年龄	0.020***(-0.003)	0.004
男性	-0.168**(-0.061)	-0.033
已婚	0.198*(0.091)	0.039
初中及以上	-0.640***(-0.076)	-0.126
参加医疗保险	-0.223*(-0.108)	-0.044
家庭劳动力数量	-0.733***(-0.044)	-0.145
自家婚丧嫁娶支出	0.506**(-0.169)	0.099
自营工商业	-0.034(0.135)	-0.007
土地面积	0.001(0.001)	0.0002
2012年	-0.316***(-0.074)	-0.062
_cons	0.940***(-0.210)	—
Wald chi ² (13)=526.36 Prob> chi ² =0.0000		
Logpseudo likelihood=-1210.5717 Pseudo R ² =0.2287		

注:同表2。

冲击的交互项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为正,并在 10%统计水平上显著。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即使亲朋借贷是零利息,但在未来某一时期须偿还欠款,若农民在偿还期到来时家庭收入状况仍未改善或依然面临遭受重大疾病的风险,那么其未来仍有可能陷入贫困。

此外,是否参加医疗保险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未参保者相比,参保者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将降低约 4.4%。在人口社会经济学特征方面,对年老者、女性、已婚者而言,他们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大。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与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农民相比,初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农民未来发生贫困的概率显著下降了 12%左右。家庭婚丧嫁娶支出则明显使农民未来发生贫困的概率增加,边际效应结果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家庭婚丧嫁娶支出每增加 1 万元,农民未来发生贫困的概率增加约 10%。在非农就业方面,自营工商业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为负,即自营工商业降低了农民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然而,这一结果并不显著。

五、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0 和 2012 年两期数据,从贫困发生率和脆弱性两个层面考察了健康冲击下民间借贷对农民减贫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目前,零利息民间借贷是农户应对健康冲击的重要方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现阶段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作用有限。(2)从贫困发生率来看,对遭受健康冲击的农户而言,零利息民间借贷显著降低了农户的贫困发生率。(3)从贫困脆弱性来看,对遭受健康冲击的农户而言,零利息民间借贷增加了农民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总的来说,零利息的民间借贷提高了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的信贷可获性,一方面增加了农民应对疾病风险所需要的资金,有助于改善其健康福利状况;另一方面降低了农民的偿还压力,从而避免其陷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零利息民间借贷也须偿还,倘若农民未来无法增加收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零利息民间借贷也可能会增加农民的贫困脆弱性。诚然,零利息民间借贷对农民贫困的缓解作用有限,而且这一资金借贷行为主要是用于日常性生活消费,其对生产性投资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考量。

上述结论对中国农村精准扶贫、农民脱贫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一方面因病致贫是农民贫困的重要原因,这就需要加大健康卫生投入,改善农民居住卫生环境,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以新农合制度为主的农村医疗保险,特别是扩宽疾病病种保障范围(如地方性、常见性慢性疾病),发挥社会保障“兜底”功能,从而改善农民的健康状况,减轻农民医疗费用负担,使其避免陷入“贫困陷阱”。另一方面,经验证据已经表明民间借贷尽管有助于提高农民的信贷可获性,可以通过向农民特别是低收入家庭提供资金而对贫困具有一定缓解作用,但可能会增加农民的贫困脆弱性。因此,既需要充分发挥民间借贷特别是零利息的互助性借贷对农村减贫的作用,引导民间借贷规范化、法律化,合法合理保障借贷双方的基本权益;同时也要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大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供给投入,提

高农业生产效益,拓宽增收渠道,从而解决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为贫困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创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 陈飞、卢建词(2014):《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经济研究》,第2期。
2. 程令国、张晔(2012):《“新农合”经济绩效还是健康绩效?》,《经济研究》,第1期。
3. 程名望等(2014):《农村减贫:应该更关注教育还是健康?——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双重视角的实证》,《经济研究》,第11期。
4. 都阳、万广华(2014):《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非正规就业及其在减贫中的作用》,《经济学动态》,第9期。
5. 高梦滔、姚洋(2005):《健康风险冲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2期。
6. 国家行政学院编写组(2016):《中国精准脱贫攻坚十讲》,人民出版社。
7. 国家统计局(2016):《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8. 林伯强(2005):《中国的政府公共支出与减贫政策》,《经济研究》,第1期。
9. 罗楚亮(2012):《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农村贫困》,《经济研究》,第2期。
10. 马光荣、杨恩艳(2011):《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经济研究》,第3期。
11. 齐良书(201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减贫、增收和再分配效果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8期。
12. 苏静等(2013):《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与地区差异——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
13. 唐礼智(2009):《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农业经济问题》,第4期。
14. 王弟海(2012):《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贫困陷阱》,《经济研究》,第6期。
15. 万广华、章元(2009):《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准确预测贫困脆弱性?》,《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
16. 夏庆杰等(2010):《经济增长与农村反贫困》,《经济学(季刊)》,第3期。
17. 许庆、刘进(2015):《“新农合”制度对农村妇女劳动供给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18. 张锦华等(2016):《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土地流转与农地滞留》,《管理世界》,第1期。
19. 张宁、张兵(2015):《农村非正规金融、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与贫困》,《经济科学》,第1期。
20. 张伟宾、汪三贵(2013):《扶贫政策、收入分配与中国农村减贫》,《农业经济问题》,第2期。
21. 章元等(2012):《一个农业人口大国的工业化之路:中国降低农村贫困的经验》,《经济研究》,第11期。
22. Chaudhuri S., Jalan J. and Sacyahadi A.(2002), Assess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from Cross-sectional Data: A Methodology and Estimates from Indonesia, Discussion Paper 0102-52,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23. Imai K.S., Gaiha R., Thapa G., Annim S.K.(2012), Microfinance and Poverty: A Macro Perspective. *World Development*, 40(8):1675-1689.
24. Mosley P., Hulme D.(1998), Microenterprise Finance: Is There a Conflict Between Growth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World Development*, 26(5):783-790.
25. Navajas S., et al.(2000), Microcredit and the Poorest of the Poor: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Bolivia. *World Development*, 28(2):333-346.
26. Stiglitz J., Weiss A.(1981),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3):393-410.

(责任编辑 朱 犁)

The Effects of Private Lending on Rural Pover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Incident Shock*Xu Qing and Others · 34 ·*

How to reduce illness-related poverty is a major task in China'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Using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2010 and 2012 survey data,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effects of private lending (especially zero interest loan) on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views of incidence an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due to a major ill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private lending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rate of poverty by coping with peasants' healthcare burden to a certain extent, it will increase the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later. Therefore, some measures about poverty reduction such as government investment, management of private lending and peasants' income expanding need to be taken.

The Influence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on Government Debt :Enlightenment from OECD Countries since 1970*Li Meng · 43 ·*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explanation about the reasons for government debt expa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in the trend of labour force from manufacture sector to service sector, the expand speed of expenditure is inevitably faster than that of income in the whole economy. These are reflected in the decline of economic surplus and the shrink of effective demand i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 difficulty in streamlining organisations and the aggravation of financial imbalance in the public sector. More specifically, government debt ratio will be correspondingly increase by 2% in OECD countries when their share of employment in service sector increased by 1%. Facing with the problems of government debt expansion resulting from structural change of employment, China should eliminate or weaken the non-market driven factor of the labour transfer.

The Measure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Human Capital*Lu Mingtao Liu Lian · 55 ·*

Based on Mincerian equation of labour income determin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human capital can be measured by the sum of relative productivities of workers with Bachelor and above degrees to newly Bachelor's Degree graduates with zero-year experience. It exploits cumulative datasets from the U.S.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and obtains experience-productivity profile for workers of each education levels with microeconomic regressions. We apply the profile to the Barro-Lee Database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ttainment to calculate human capital stocks for all countries in the dataset from 1950-2010. The results show: the U.S., India, Russia, China and Japan rank top five in aggregate human capital, but China ranks 108 out of 145 countries in terms of human capital per labour. A more detailed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using China's Sixth National Census data and US CPS 2014 data indicates that China's aggregate human capital amounts to only 29.46% of that of the U.S. Therefore, there is urgent need for China to promote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A Study on the Model of Male Marriage Squeeze of China*Guo Zhen and Others · 69 ·*

China is now undergoing an intensifying marriage squeezing since the cohorts of high sex ratio at birth in 1980s keep entering into the marriage market. Using censuses data, this paper improves the existing theory of marriage squeeze by analysing the model of China's intensifying marriage squeeze of males in demographic area. The study finds that, from the period perspective, the model of China's marriage squeeze of males in the rural areas shows a distribution of very low level of first marriage. Moreover, the age pattern of probability of first marriage skew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average age at first marriage ceased rising. The mappings show that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males' marriage squeeze is beginning to spread out besides convergences in certain squeeze arrears. From the cohort perspective, affected by the lower age-specific probabilities of first marriage and higher age-specific probabilities of death in rural areas, the age-specific percentages of marriage for single survivors in rural areas are lower than that in urban areas, and age-specific years of single life remaining in rural areas are higher than that in urban areas. These two cohort indexes illustrate that China's marriage squeeze of male in rural areas is much severer than the situations revealed by period index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arriage squeeze of unmarried males in rural areas may constitute future situation of marriage squeeze in whole China.